

《牛津西方音乐史》 颠覆音乐史传统叙事

□殷石

19世纪奥地利音乐历史学家安布罗斯未完成五卷本(实际只完成三卷,后两卷由他人补充)《音乐史》,20世纪法国音乐学家昂立·普吕尼埃尔只写完两卷《新音乐史》,可见,由一位作者撰写的多卷本西方音乐史的尝试总是历经波折,直到这套五卷本的《牛津西方音乐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横空出世。对于这部巨作,音乐学界、评论界、出版界感受到的是“颠覆”“批判性”“另类”“犀利”……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曾在《音乐的伟大性》中认为,评判伟大性的一个要素是“高产”,因此作品的量便可成一项衡量艺术家的指标。同样,这套《牛津西方音乐史》逾4000页、近300万字、超500幅插图以及约1800条谱例的篇幅,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塔鲁斯金在其论著中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调用史料的能力,无论是政治史、文化史,还是音乐史料、政治分析,塔鲁斯金的研究思路有着详尽的材料支撑。个别历史信息,甚至在各类历史资料中都有探讨,塔鲁斯金却可信手拈来,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样一部音乐史巨著中,塔鲁斯金并没有淹没在史料的汪洋中,而是相当清晰地规划出一条叙述线路,剔除对历史叙事无用的材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没有不能支撑历史逻辑的话语,排除了以往通史或断代史中那些列表和数据罗列。塔鲁斯金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了卡尔·达尔豪斯提出的艺术史是“艺术”的历史还是艺术的“历史”的问题,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第一卷的正文开头,塔鲁斯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的故事必然要从中间讲起”,而第五卷的最后一句话则是“我们的故事必然要中道而止”。以此,塔鲁斯金构建起了一个跨越



4000多页的“故事”。可以说,在这套音乐史中,塔鲁斯金力图实现一种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比起许多通史和断代史中作者隐形于文字之后,并以此实现一种客观和抽离,塔鲁斯金的文字则令人感到作者像是站在读者面前讲述“故事”一般。“音乐成为一门生意”“受诅咒的问题”“虚构的民间音乐”……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塔鲁斯金的这部音乐史摒弃了以往以风格、主要作曲家、主要作品为核心的编纂方式,而以自己的方式洞悉何为音乐史中的“事件”。

作者的“显形”使《牛津西方音乐史》在历史叙述之外也兼具犀利的历史批评,传统的历史编纂理念、音乐史家甚至西方的音乐文化现象等等,都成为了塔鲁斯金的批评对象。这种深度的反思精神,也是《牛津西方音乐史》成为一部极富洞见和启发的史学著作。

音乐史需要被不断重写,在史料被一次次结构中,音乐史便会不断地丰满。而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必定会在音乐史学术中占据无法取代的位置,中文版《牛津西方音乐史》的出版也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世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缘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 从全局视角理解王安石变法

□杨光

梁庚尧先生的新著《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缘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东方出版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景式审视熙宁变法的新视角。这本书虽然形式上是由课程讲义编著而成的教科书,但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将学界诸多前沿成果融入其中,并提出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独到见解,使得本书在平易流畅的文字之间又蕴含着相当的学术性。

本书写作层面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将熙宁变法同宋代历史整体演进之间的关联,清晰而全面地呈现了出来。熙宁变法是一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宋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全面理解熙宁变法的历史意义,便不能仅着眼于二人物与个别法条。作者在回顾本书缘起时,便讲到当初开设“北宋的改革与变法”这门课时对它的定位,是“专题式的断代史课”,“同时归之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两大范畴”。

本书除序言外,共分为四编十八讲,外加附录的一篇文章。第一编主要叙述庆历新政的缘起、经过与影响,作为熙宁变法的背景加以考察。第二编集中探讨宋神宗时期各项新法的酝酿与推行过程,及其在对外关系、社会经济层面带来的社会影响。第三编关注新法带来的政治斗争,分析神宗朝以降北宋竞争的激烈化与政策的反复。第四编进一步分析了新法对南宋财政、政策与制度的影响。

本书围绕熙宁变法这一中心的讨论,



在时段上几乎覆盖整个两宋时期,一方面梳理熙宁变法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则从熙宁变法出发理解宋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内容上,不仅关注新法的内容,更延及围绕着变法改革的政治角力、体制变迁、军事外交、国家财政、社会经济等问题。这种长时段、多角度的叙事,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既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也是其核心学术价值之所在。在很多重要议题上,本书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例如,在王安石新法的性质问题上,学界向来有视其为社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两种对立观点。本书则指出,新法的目标是“以社会政策而兼收财政政策的效果”,施行时则“以财政的考虑为优先”。这一看法并非简单调和说,而是通过详细梳理熙宁变法的背

景、内容与推行过程得出的坚实结论。

本书第三编对于北宋后期政治史的叙述与分析亦颇具新意。北宋后期的党争逐渐激烈化,以至于不可收拾,但导向这一结果的路径却是异常复杂的。本书对北宋后期政治历程的梳理,不仅着眼于朝堂上的政治冲突,更敏锐地注意到台谏机构、皇城司等制度变化同当时政治风气转变的关系,线索清晰,要言不烦。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本书第四编关于熙宁变法对南宋历史影响的分析。梁庚尧先生于此另辟蹊径,从制度延续性的角度着眼,详细考察了熙宁新法的制度设计及具体举措对南宋诸多同类政策的影响,发前人所未发,极具启发意义。当然,熙宁变法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南宋时期的回响亦不止于制度领域,本书的讨论仍显犹未尽。梁庚尧先生另著有《南宋朝野论王安石与新法》一书,也是对本书第四编的进一步延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相比于政治、制度层面细密生动的论述,本书对于与熙宁新法密切相关的学术思想特别是王安石“新学”的问题探讨较少,不得不说是点遗憾。然而术业有专攻,自然不可苛责一部著作能够面面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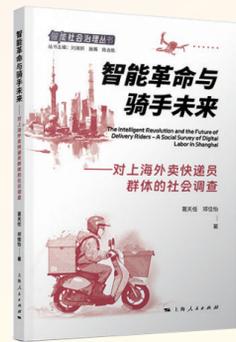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本书内容翔实,结构清晰,视野广阔,充分反映了当今学界对熙宁变法诸问题的认识水平,且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对于希望全面了解熙宁变法的读者而言,是一本极佳入门读物。

《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 为智能社会治理提供有力论证

□韩焯

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困境日益凸显。由“索洛生产率悖论”带来的连锁效应相伴而生,即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传统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转向了具有优秀教育背景且能力出色的精英。但对于更多人来说,在劳动力市场的屡次碰壁之后,外卖骑手成为他们应对智能社会变革的就业退路选择。这种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劳动变革不是“社会问题”,只有在缺乏理性认知和有效应对的情况下才会演变成问题。由同济大学教授葛天任和邓佳怡执笔的《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认识及有效整合多方支持力量进行该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尝试,也为智能社会治理聚焦于数治与数智领域提供有力的论证。

这部书的学术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为交叉学科探索开阔了广度的视野。虽然数字递送群体是新职业群体,但他们并非凭空产生,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独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一般的社会调查报告不同的是,作者对这一群体“前世今生”的多学科理论认知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反思。



如聚焦劳动过程而忽略职业发展的社会学视角;致力于探究制度因素而忽略个体感受的政治学、法学视角;强调算法控制效率优先而淡化人权保障的经济学视角。用作者的话说,“见人也见制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展现出作者对已有理论反思的学理性批判与提倡交叉学科对话的勇气,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主体性发展而努力。

二是为本土研究新问题的“从实求知”扎根了深度的田野。智能革命为传统研究带来了颠覆性影响,西方理论与经验

在解决中国劳动问题时遇到瓶颈。本书从群体特征、工作状态、工作诉求、观念心态、职业发展等方面,系统描绘了当下中国社会数字递送工人的全貌,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该群体的努力与拼搏、疲惫与渴求、满足与无奈。这些多层次田野事实不是简单的裁剪,而是系统性调查诠释的整体样态。这个田野“拼图”历经6年,过程本身就展示了作者团队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探索。

三是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精准的实践转向。“一老一小”问题是当前加快完善社区功能的重要举措。本书提出的“全龄友好社区”概念,突破了已有研究聚焦长者幼者的局限。正如书中所述,劳动者处于全龄周期的中间力量,个体生活质量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密不可分。“社区骑手”这一原创性概念的提出,为解决数字递送工人社会保护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让我们在学理上以及政策执行中重新审视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新面向,探索实现社区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新布局。

技术进步与日益严苛的职业要求之间的竞赛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当我们确保智能革命能够造福于大多数人的同时,亦需要在经济理性与生活需要之间重新找到属于社会的功能。

《惊鸿》 展现二十世纪青年特有的勇气

□张诗扬

范迁的《惊鸿》(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部宏大而细腻的中篇小说,讲述20世纪后半叶,一群年轻人在离散与漂泊中叩问艺术之道,经历命运的流转。小说的叙述空间横跨长江三角洲、东南亚与法国,最终归拢于巴黎,完成一首关于游荡与告别的诗篇。

小说不仅视野广阔,触及的生命体验也丰富。从少年时爱情与理想的热烈,到中年背负命运、求索自我之路的孤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图景,就这样随着书中人物的脚步,逐步在我们眼前展开。

令我倾心的,是书中人物所展现的20世纪青年特有的勇气。这种品质在科技、交通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反而显得越发稀缺。身处陌生的世界,他们语言不通,生活窘迫,却因为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展现出非凡的意志力。因为爱着艺术,这爱就赋予了他们心智的安全和强大的动力,积极地与外部世界接触,不断以异文化检视自身,从而活得愈发开阔。

我很喜欢书中的一段,是牧月之初,几个年轻人推着他们其中一位身有残疾的女孩的轮椅,在巴黎街头迤迤夜行。如此年轻而生机勃勃,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青春。不禁让我想起自己10年前编辑出版的另一本书——帕蒂·史密斯的《只是孩子》。尽管一本是小说,一本是回忆录,但在两位步入老境的作家所营造的虚拟时空中,都弥漫着如此真实的青春的炽热。他们的作品提醒着我们,尽管青春终将逝去,但我们依旧可以继续保有青年时代的生活态度。这是生命留给我们的每个人的、可供随时取用的源泉。

小说的主人公范国粹是一个将自己一生奉献给艺术的人,也是小说所有人中,从未对过使命产生过怀疑的人。然而,直到小说末尾他在贫病中去世,读者依然无法确定他是否被艺术所接纳。这答案显然已超出了小说的时间边界,也不在作者的关注点之内。



工作带给范国粹的,是一种丰富的孤独。这种孤独不可或缺,却也让他牺牲了爱情与生活,给爱过他的人带来爱的幻灭和独自面对的艰辛现实。正如作者所言:“艺术女神真是残酷,你殚精竭虑,奉献出一生,但她很快把你遗忘。”这种失落的本质是一种失衡,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我们将信任寄托其中,却常在命运的无常中被迫接受现实的另一面。它们赋予孤独以意义,却无法弥合生活的裂痕。

那么,我们为何要去爱?工作的意义又何在?在作者看来,范国粹的坚持,不在于他是否最终被艺术接纳,而在于他通过工作为自己的存在赋予了意义。“也许这就是投身艺术的意义:无论能否攀登到顶峰,只为在空虚的世界里,用一个脚印,敲出自己人生的回响。”所以,尽管爱与工作无法拯救我们,却能成为我们表达生命深度、定义自我的媒介。

在延续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工作、爱与青春的游荡之后,小说的结尾,随着逐步老去,人物们都找到了各自生命的意义与归宿所在。范国粹在遗书中写道:“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再见的意义,就是一定会见到。”那么,那些因爱与劳作而受到的损耗,或许也终将在那一天可以得到修复。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最深沉的希望与慰藉所在。

《我的小王国和小国王的零》 童话写出命运感

□郭艳

《我的小王国和小国王的零》(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一部治愈系童话,治愈童年创伤,疗愈亲子关系,让爱在命运的打击面前依然保有深切、饱满与高贵。文本叙述了儿童精神世界发生的奇妙故事,作者将失去母亲的悲伤以想象的方式置换成为少年的奇幻之旅,通过阿鲸在零世界的历险,讲述了少年主人公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蜕变与成长。

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时空中,少年阿鲸邂逅了小王国,进入了小王国的零世界。穿越黑暗的隧道、草地和旷野,阿鲸到了一颗流光溢彩的星球——这里充盈着幻想和现实交织的各类事物。龙卷风可以在陶埙舒缓的音乐声中消失,金色的沙漠、银色的月光和火红的朝霞瞬间万变,幻想鸟如白云般从天际飞来,消失的狗狗闪电重新汪汪叫起来,阿鲸穿上了妈妈送的格子睡衣……这里既是梦幻的又是真实的。零是一个奇迹,在这里各种蛋不知道何时生,何时长,也不知道蛋里会生出什么;小王国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时而是孩童,时而是威严的国王;阿鲸在零里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然



而每一次遇见都是一次惊喜……童话世界里充满未知的神秘性,有着无限可能的不确定性,带着憧憬与期盼的互文性,这些让文本充盈着轻松、充盈又浪漫奇幻的色彩。

想象力是需要落地的,小主人公阿鲸在充满未知的神秘国度中,经历一系列的冒险之旅,完成了想象力的落地。这篇童

话想象力勃发,有着令人惊喜的创造性。在整部童话中想象力始终以一种飞翔的姿态呈现:零的世界是流动的,风、天空、草地、沙漠、森林随时变换,炫目的色彩流光溢彩,奇妙的景色流动不居。在阿鲸的心理时空中,想象力可谓随物赋形,创造着一个属于阿鲸的独特世界。在向北方寻找小王国的过程中,阿鲸慢慢体味到零存在的真正意义:零是心灵的王国,想象力飞翔的时空。零让阿鲸看清了自己真实的内心和真实的愿望——爱与思念,创伤的治愈是在于自我、他者和世界共情中得以完成。

童话文本写出命运感难能可贵。在命运掌控下的阿鲸会怎么样?作者让阿鲸邂逅了小王国和他的零。小王国是一个威严又体贴的朋友,是阿鲸精神上的引领者,引导着阿鲸进入自己的心灵镜像。然而,真正直面命运的必须是勇敢的小主人公阿鲸!文本内核是写儿童心理创伤,创伤的治愈却是通过少年对于现实的观察、理解和认知完成的。文本在充满象征性的人物、情境和场景中,温情而体贴地阐释了现代原生家庭的爱与亲子成长。